

复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Fudan Forum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学 院

春季号

Spring, 2011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1 年春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目 录

编 委 会

主编:曲卫国

本期执行主编:曲卫国

本期栏目负责:

文 学:张 冲

语言学:曲卫国

翻 译:何刚强

本期编辑:

林骧华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陈 靛

何刚强 姜 宏

姜银国 李 征

陆谷孙 曲卫国

沈 黎 沈 园

谈 峥 唐 敏

汪洪章 王建开

魏育青 熊学亮

张 冲 褚孝泉

朱永生

北欧文学专栏

从性别角度评孟加拉国版《群鬼》——《克里斯纳比巴》…… 莎碧哈·哈克(3)

易卜生的《布朗德》:在孟加拉国对原教旨主义的一份控诉书

…… 艾哈迈德·艾撒纳泽曼(8)

“政治狂欢”:易卜生戏剧与当代孟加拉国 …… 沙菲·艾哈迈德(16)

外国文学研究

论《裸者与死者》与《贝奥武甫》的否定互文性 …… 丁秉伟(25)

从《阿凡达》看后现代符号经济下神话思维的复兴 …… 吴 娟(29)

情人、物件、文化之恋:评《纯真博物馆》的幽灵性 …… 支运波(34)

本雅明《柏林童年》的批判性题旨 …… 王 涌(40)

鸟迹与龙文:哈代小说《苔丝》的诗画艺术 …… 罗杰鹏(45)

语言学与教学研究

从联想反应类型和母语影响看二语学习者的心理词汇 …… 郑咏滢(53)

不同水平写作者语篇组织能力对比研究 …… 王志军 Zhihui Fang(61)

日语平板式声调习得的实验性研究 …… 刘佳琦(66)

语言系统中的意识形态与外语教学 …… 董宏乐(72)

从语际距离看对外西语教材编制:以第三人称宾格代词为例 …… 曹羽菲(78)

对大学生英语词汇学习策略使用的调查研究 …… 吴 晶(84)

网络社区的自我呈现 …… 何 玲(90)

翻译与辞典研究

邝其照和他的《华英字典集成》 …… 高永伟(101)

论作为翻译课教学方法的重译 …… 王晓军 武 辉(108)

书评

走向对话的批评:评《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 …… 王祖友(117)

翻译研究的语用学新视角

——评陈科芳博士的《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 …… 肖维青(121)

CAT, 1996.

- [4] Nilu, Kamaluddin. "Open Discussio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and Workshop on Gender Issues in Ibsen Plays*. Dhaka: Centre for Asian Theatre, 1997. 214-238.

[5] Pavis, Patrice. *The 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6.

[6] Reza, Ahmed. "On Adapting *Ghosts*." "Programme Notes" of *Krishnabibar*. Dhaka: CAT, 1996.

易卜生的《布朗德》：在孟加拉国对原教旨主义的一份控诉书

艾哈迈德·艾撒纳泽曼

摘要：本文研究《布朗德》在孟加拉国的上演表现。在2004年的首演之后，因其对当代社会和国家政治较强的针对性，而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关注。本文认为由于这个国家人民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所拥有的直觉知识，观众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布朗德”当做是一个穆斯林狂热分子。本文通过叙述最近这个国家一些令人不安的原教旨主义活动情况，指出在过去四年里原教旨主义有了上升的势头，让《布朗德》在如今的孟加拉国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对象。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studies the performance of *Brand* in Bangladesh, which has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both audience and critics since its opening night in 2004 for its concern with the present society and national politics. The instinctive knowledge the Bangladeshi people have obtained about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extremism leads the audience to regard Brand as a Muslim fanatic. By narrating the disturbing fundamentalist activities that recently take place in Banglades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undamentalism has been on the rise for the past four years, which accounts for the wide attention this play receives in today's Bangladesh.

关键词：易卜生；《布朗德》；孟加拉；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

Key Words: Ibsen; *Brand*; Bangladesh; fundamentalism; extremism

一、引言

孟加拉国最大的剧团，亚洲戏剧中心（CAT）于2004年上演了易卜生的戏剧《布朗德》。该剧由穆尼则·艾·莫瓦拉（Munzur-i-Mowla）翻译，由长卡玛鲁丁·尼禄（Kamaluddin Nilu）执导，因其上演表现出对当代社会和国家政治较强的针对性而引起观众和评论家的关注。尼禄在他那篇关于《布朗德》的文章（Nilu, 2007:105）中着重强调观众和评论家对这部作品都抱着赞赏的态度，他指出，“他们发现这部作品与孟加拉国当代社会高度相关。”此外，亚洲戏剧中心于2006年对2年内55场次《布朗德》的上演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观众可能把它当做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一种对抗。不过，一开始我就需要表明的是，那些把这部戏剧看作是对当代孟加拉国的一次评论，只是属于一小群社会特权集团的人，按照孟加拉国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可以被划分为精英阶层。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出百分之四十一的受

访者认为《布朗德》是对利用宗教来牟取权力的一种当代的表达。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为它揭示出盲目、狭隘的观点是如何通过歪曲宗教来使其成为宗教信仰，而其他百分之九的受访者认为它展示了贫穷、落后的人是如何一无所有的。易卜生其他一些常见和流行的在这个国家上演的戏剧，通常不会被观众们拿来与当今的孟加拉国相对照，但这部戏剧却与众不同地被他们拿来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相关联。

在本文中，我研究了当前的孟加拉国社会政治动力是如何去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出现，这些原教旨主义者热切地呼吁复苏他们身上“原初的”伊斯兰教的印记，从而使那些最初的观众更加容易理解和欣赏《布朗德》。我将叙述这个国家最近一些令人不安的原教旨主义活动来指出，原教旨主义者的暴动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环境，让这部于2004年获得赞赏的戏剧在2005年8月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从而使之成为在孟加拉国对原教旨主义的一份控诉书。

的呼声。孟加拉国著名教育家瑟拉久·伊斯兰·乔杜里(Serajul Islam Chowdhury)教授在10月18日组织的一次达卡大学集会上说：“最近的事件是以宗教为背景政治活动的结果。……原教旨主义者正在袭击孟加拉国的艺术和文化”。该大学的波斯文化系主任说，“这种对艺术的摧残与宗教或伊斯兰教毫无关系”。(bdnews24 2008a)

但是这些抗议、示威和批评明显没有带来任何帮助。事实就是包尔的雕像还是被拆除了。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通过拆除这件建筑物的方式对包尔文化传统发动袭击，是因为包尔文化成长于“苏菲教派”和“湿奴教”亲密无间和生机勃勃的融合时期，它还赋予人类至高的重要性。它拥护爱和忍耐，践行着一种兼容并蓄、团结友爱的哲学，这都让狂热分子们无法忍受。他们抱着一种自负而又狭隘的观点，他们的成功基于大众的愚昧和滥用武力。仅仅当大众对宗教在内心深处感到害怕之时，原教旨主义的阴谋才能够得逞。瓦留拉哈(Waliullah)的存在主义小说——《拉尔·沙鲁》(《无根树》)中的主角马吉德恰好用的就是这一招，他通过欺骗愚昧的村民，让他们惧怕质疑宗教，从而给自己赢利：

你们的心开始厌恶真主。你们为这个世界和它的欢乐而活。你们从不考虑下一个世界，更为重要的那一个，是它带来了永生，而且根据你在这个世界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你是否能获得永生。……这些在这个世界欢笑、歌唱的人，他们遗忘真主，或许在下一个世界就无法再笑了。真主阿拉将给这些拒绝相信者以惩罚：等待他们的将是可怕的厄运。^①

另一方面，在《包尔》的信条里，用爱来代替恐惧，主张用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原教旨主义者狭隘的观点必然与《包尔》的教义相抵触，因为他们一直就与伊斯兰教的融合价值观有冲突。

这个国家崩溃的政治体系再一次与主要的政党如人民联盟、国民党和民族联盟一起浮出了水面，这些政党自解放之后就开始管理国家——但他们对这个敏感的拆除雕像的事件保持了事实上的沉默。尽管人民联盟对这一事件给予了一定谴责，国民党则对此一言不发。这个国家的各大政治首脑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却是相当的消极。然而寺坊拒绝对此事作出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本质上就是这个国家核心的原教旨主义政党。但其他一些大党的“沉默”进一步凸显出这个令人担忧的事实，那就是他们为了政治利益，不仅对寺坊，也对其他一些

伊斯兰势力采取宽容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为孟加拉国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温润的土壤。

2. “原教旨主义者对马泽斯和大众化娱乐方式的攻击”

因为伊斯兰教的融合传统的影响，在孟加拉国派的“马萨尔”(圣地和陵墓)周围形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氛围，他们广纳信徒，不论宗教、种姓和信条。除了晚上的常规集会，他们过去还每年在“马萨尔”地区召开圣会(一般叫做乌尔)，由从这个国家偏远地区而来的信众自愿参加。但是，这里我并不是想暗示这个传统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所想表达的是在孟加拉国民党领导的同盟政府期间，“马萨尔”文化在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复攻击的对抗过程中迅速衰落。

因为原教旨主义者瓦哈比教派的信徒认为关心泊尔、参观圣地等同于偶像崇拜，因此也是反伊斯兰的，并且很可能在当局的赞助下，他们轰炸了数个“马萨尔”，导致相当数量的信众死亡，从而散布出一波恐慌。全国范围内对“马萨尔”重复循环的轰炸和袭击，已经让“马萨尔”文化处于一种事实上灭绝的状态。这些人只不过在这里唱唱圣歌、跳跳舞而已。通过巩固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原教旨主义者已经侵蚀了“马萨尔”。通过他们的果断干预，“马萨尔”文化在今天除了一堆先人赤裸的骨架，就什么也没剩下了。扎卡里亚在重游了一些“马萨尔”名胜之后，这样写道：

这个国家的“马萨尔”已经完全丧失他们在过去曾经拥有的一些特色。……伊斯兰教徒已经侵入了“马萨尔”。……他们已经用伊斯兰教法(规章制度)的习俗取代了马萨尔文化的习俗。现在在这个国家主要的“马萨尔”，你将再也不会看到信众的聚会、也再也不会听到他们的歌声了。(Zakaria, 2008)

除了攻击“马萨尔”，这些原教旨主义者在过去几年里还展开了对大众娱乐设施的致命袭击。这些好战的极端主义者在2001年4月14日传统拜萨客节(孟加拉历年的第一天)袭击了达卡市的Ramna广场上正在举办的庆祝活动。这次可怕的袭击让10人

^① 瓦留拉哈，斯耶德。《拉尔·沙鲁》(1949年)。(《无根树》——由萨义德及其他人译自孟加拉语)。伦敦：查特·温都斯书局，1967年，第一卷，26—32页。瓦留拉哈(1922—1971)是孟加拉国一名先锋派作家，其深受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主义的影响。《拉尔·沙鲁》揭露出宗教伪善的一面，以及一旦对宗教的忌惮心理被成功地植入愚昧的大众内心之后，宗教是如何来剥削他们的。

致死,并且让50个无辜的群众受伤,这些人都是这次由这个国家的主要文化组织(Chhayanaut)组织的庆祝活动的参与者,这种庆祝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已被取缔的好战机构——伊斯兰圣战运动(通常被称为HUJI)宣称实施了这次袭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庆典有悖于伊斯兰精神。此外,宗教狂热分子于2002年12月还在迈门辛的四所电影院里同时引爆了数枚威力巨大的炸弹,造成了20人死亡和超过200人受伤,而这是一个距离首都150公里远的安静小镇。2002年9月28日,这些好战分子们还把在萨德基拉的一个叫做Gurpukur mela的民俗集会上的游客和一家电影院作为他们的炸弹袭击目标,而这里是最偏远的乡镇之一。(Muktadhara, 2008)此外,这些狂热分子还数次袭击了被称为雅却的一种单纯的通俗戏剧演出。在2005年1月中旬,他们袭击了两个农村地区的雅却,造成了两人死亡,超过六十人受伤。(The Daily Star, 2005)

3. 原教旨主义者对艾哈迈德亚(Ahmadyya)穆斯林团体的袭击

在过去几年里,这个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针对属于孟加拉国艾哈迈德亚穆斯林团体的成员和清真寺,发动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攻击。这些原教旨主义者或者独自、或者与一个伊斯兰圣战组织联合,将艾哈迈德亚教徒从伊斯兰教中驱逐出去,把他们叫做卡菲尔人(异教徒)并多次迫害他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在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艾哈迈德亚教徒都是受到限制的。原教旨主义者屡次采用暴力方式,用致命武器来向孟加拉国政府施压,要求官方将艾哈迈德亚教徒称为非穆斯林。尽管政府并没有宣布将他们称为非穆斯林,但是禁止了他们的出版物。政府的行为从本质上是违宪的,因为孟加拉国宪法里保障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这些狂热者并没有平息下来,他们继续对艾哈迈德亚教徒发动袭击,甚至杀死了一名艾哈迈德亚教的牧师。狂热分子并不用艾哈迈德亚教徒来称呼他们,而是嘲弄般地叫他们为恰迪严特(Qadiyaniat),因为他们认为艾哈迈德亚教的创立者米尔扎·古拉姆·阿赫默德——1835年出生于印度旁遮普的恰迪严(Qadiyan),卒于1908年——是一个骗子和英帝国主义的一个代理人。按照他们的解释,“恰迪严特教徒都只不过是——是一群卖国贼、变节者、无信仰者和异教徒”(Khatum-E-Nabuwat 2008)。从而认定对他们的迫害是所有“真正”穆斯林的一种“宗教义务”。所有艾哈迈德亚教的团体,世界范围内的“艾哈迈德亚

穆斯林团体”和“为传播伊斯兰教的拉合尔艾哈迈德亚运动”,尽管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但都再三地否定了原教旨主义者的指责。他们都认定自己也是穆斯林,并且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实行伊斯兰教。因此,让人困惑的是:当他们认定自己也是穆斯林时,原教旨主义者是否有任何权利称他们为非穆斯林?《古兰经》赋予众人自由践行宗教的权力:“宗教不应当强制”。在这本圣书的其他地方,真主阿拉甚至允许人民提出不同信仰:

服从那些信仰的人、服从阿拉、服从他的信使以及你们当中的当权者。那么如果你在任何地方有何不同的话,请向真主求助……如果你是真主的信徒且相信末日的话。那么这就是最好的和最值得称道的结束了(Quran, 4:59-60)。

以上《可兰经》的引文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些原教旨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随后针对艾哈迈德亚教徒的暴力行动恰恰都偏离了真主的劝诫。孟加拉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已明显违背了真主的旨意,并始终造成有争议的问题,他们已经无视法律和教规,不断地袭击艾哈迈德亚教徒。在孟加拉国,《布朗德》是对原教旨主义的一份控诉书。

以上提到的原教旨主义的活动表明,宗教偏见已成为孟加拉国的一种顽疾。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布朗德》的上演强调了一个事实:这个国家的宗教狂热分子对待伊斯兰教的自负和狭隘态度可以在“布朗德”身上体现出来。在作出上述判断之前,我将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引导该剧的导演——尼鲁通过参照以上我所论述的内容,在他的论文中论证“布朗德”是个原教旨主义者。

尼鲁说,他之所以决定上演这部戏剧,是因为他发现:“布朗德武断的行为方式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也就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孟加拉国在内的)伊斯兰教组织打算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条(伊斯兰教教法)的持续世界”。(Nilu, 2007:105)为了支撑他的论点,尼鲁简短地描述了由伊斯兰阵线所带领的在孟加拉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尼鲁提到了原教旨主义者以及狂热分子对艾哈迈德亚教徒的迫害,他们要求“停止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无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因为这些都被认为是反伊斯兰教的”。这些极端组织还实施了“大量自杀式和其他方式的暴力袭击事件”。对我来说,尼鲁文章里最具启发性的部分就是:他发现布朗德思想和原教旨主义者的惊人相似。以下是我所进行的详细比较:

布朗德的基本思想： 1. 布朗德认为上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 2. 布朗德认为信仰和生活是一致的——每一种行为都应遵从上帝的旨意。 3. 对布朗德来说，他不会接受任何妥协——“妥协的精神是属于魔鬼的”。 4. 布朗德认为牺牲是绝对的、需要个人救赎（奖赏），并且要改变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基本思想：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真主至高无上。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每一个行动都应遵从真主的旨意；应该依照《可兰经》和《默罕默德言行录》来生活。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把牺牲生命来保护伊斯兰教和讨伐异教徒（发动对非信仰者的战争）当做是绝对义务，并且要求采取殉难（个人回报）和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教法（伊斯兰的法律）的社会。
--	---

虽然尼鲁的文章揭示了很多方面，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明显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利用圣书来驳倒原教旨主义者的主张。例如尼鲁认为：“尽管这部戏剧也部分地谈到了基督教义里的十诫”，他还补充说“布朗德可以说是有意识地打破了第五戒”（同上，108），对于摩西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布朗德没有任何想说的。因此，根据《圣经》，他认为基督是不会对这句话不予理睬的：

“你们听见有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向你索取的人，你要给予；向你借的人，不要背对他。……‘你们听见有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敌人。’但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迫害你的人祈祷，你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祂叫祂的日头上升，照恶人，也照好人，并且发送暴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圣经》：8—9）

如果尼鲁考虑了基督的布道，他一定会去断言，正是布朗德的过分狂热导致他狭隘的基督教观点。类似地，如果他把《可兰经》中的相关经文也仔细研究过的话，他本来可以推论出伊斯兰教是谴责那些狂热者的疯狂行为的，而那些狂热者仅仅为了政治利益而曲解宗教里的信息。

不过我同意尼鲁关于“……当代与《布朗德》相关联的都是政治性的”。（Nilu, 105）这部戏剧所包含的政治内容不仅仅是对这个国家腐烂政体的揭露，而且是对宗教在国家事务中的角色以及关于妇女权利这样紧迫问题的调查。作为对本地政治的评论，《布朗德》可谓让人大开眼界。它揭示出孟加拉国政治的破产，不管什么党派的政治客们都不顾公民的悲惨生活。这部戏剧的上演强调出政治家和宗教领袖之间的不圣洁的关系。孟加拉国的布朗德显示出当权者与神职人员相互勾结，打着宗教的名义压榨百姓。尽管在与他的孟加拉同行相比时，纳卡帕（Nagarpal）（市长）显得相当“可爱”，但他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来紧握住权力。他与那些支持他的神职人员结成强大

的联盟。孟加拉国人民近些年目睹了这种令人反感的勾结。这些原教旨主义的领导人目光之所在，是在这个国家进行一场伊斯兰革命。塔利班化的孟加拉国的梦想可能会变成现实，那时像布朗德这样的狂热分子将进一步巩固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事实上，原教旨主义者最近在街上游行时所喊的口号就是“amra shobai taliban, Bangla hobe Afghanistan”（我们赞同塔利班，孟加拉国将变成阿富汗）。据报道，原教旨主义者的重要人物正通过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网络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在尼鲁的理解里，“是布朗德造成了艾格尼丝的自杀”，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导演时，他“让她明确地自杀了”。（Nilu, 109）。由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引起的艾格尼丝的自杀，与最近孟加拉国历史上的许多妇女的自杀或受虐的事件相似，而他们正是因为被毛拉们宣称涉嫌违反伊斯兰法规。“至少有 12 个非常年轻的育龄妇女受到了裁决（这是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制订的，却没有得到孟加拉国法律体系认证），其中有些人致死，在 1994 年孟加拉国的不同地区”。（Lucas 76）不久前的看守政府不得不在提出的“2008 年全国妇女发展政策”上退了步，就因为这个宗教势力认为这个政策是“反伊斯兰的”，并且通过街头骚乱和暴力抗议来施压。因此，尼鲁的《布朗德》为那些“……妇女听众”提供了机会来“超越他们的文化框架的霸权，质疑和瓦解了约束妇女的性别机制”。（Hollidge & Tompkins, 177）

正如尼鲁所表现的，布朗德对待他的母亲和妻子是不人道和残忍的。在布朗德的世界里，普通百姓特别是妇女没有任何发言权。在他重男轻女的世界观里，妇女被降低为第二性的；他们可以是母亲或妻子，但绝不能与男性相对等。父权制赋予男性的优越地位让布朗德对他的母亲指手画脚，尽管是以“宗教”的名义要求的，但这种要求本身在宗教上却没有坚实的基础。布朗德的母亲不能嫁给她所爱的人，因为这是由她的父亲决定的，这也暗示出一个事实，就是父权制的价值观让孟加拉国的妇女长期沉默。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嫁给布朗德的艾格尼丝与那些孟加拉

国新一代的妇女是相似的,他们都认为有权利自己选择伴侣。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新一代的女性所面临的命运也正是该剧艾格尼丝所遇到的问题。可悲的现实是,他们的丈夫——父权制的使者,都很少会在他们的世界里将妇女当做人,从而让她们以与艾格尼丝类似的方式来结束生命。这部剧体现出了孟加拉国社会中处于绝对优势下的家长制框架下妇女的困境。从这个角度来看,布朗德的母亲拒绝放弃他所要求的一切,而艾格尼丝的自杀作为妇女的自觉行为,是为了推翻约束他们的父权制和原教旨主义的霸权。

四、总结

尽管保留了“异国色彩”,《布朗德》还承担着“一种本地意义”(巴鲁恰, Bharucha, 2000:72),因为它的观众会把它与当代孟加拉国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凭借他们对最近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兴起的认识,观众们会把布朗德设想成一个穆斯林狂热分子,带着狭隘宗教观,想要在这个国家恢复他的“原初的”伊斯兰标签。因此,《布朗德》可能成为孟加拉国的借鉴,也并不是夸大其词。

(作者单位:孟加拉库尔纳大学)

参考文献

书籍与论文

- [1] Ahmed, Rafiuddin. "Introduction: Towards a National Identity." *Religion, Identity & Politics—Essays on Bangladesh*. Ed. Rafiuddin Ahmed. Colorado Spring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Ltd., 2001. 26.
- [2] Bharucha, Rustom.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Practice: Thinking Through Theat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72.
- [3] Holledge, Julie and Joanne Tompkins. *Women's 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4] Latif, Sk. Abdul. *The Muslim Mystic Movement in Bengal 1301-1550*. Calcutta and New Delhi: KP Bagchi & Company, 1993.
- [5] Lucas, Marie-Aimee Helie and Harsha Kapoor. *Fatwas Against Women in Bangladesh*. Grabels: 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s Laws, 1996.
- [6] Nilu, Kamaluddin.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Ibsen's *Brand*—The Cas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bsen Studies*, 7.1 (2007): 105-121.
- [7] Roy, Asim. *The Islamic Syncretistic Tradition in Beng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8] Saifuddin, Ahmed. *The Roles of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angladesh*. Åbo: Åcademy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 [9]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London-Sydney-Auckland-Toronto: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9.
- [10] *The Quran*. Trans. & Ed. Muhammad Zafrulla Khan. London and Dublin: Curzon Press, 1971.
- [11] Waliullah, Syed. *Lal Shalu (Tree Without Roots)*. Trans. Saeed et al.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7.

报纸与电子资源

- [1] Ahmed, Rahnuma (a). "The Familiar Order, Not Easily Undone." *New Age*, September 22, 2008a.
- [2] _____. (b). "Lalon and Terror: Re-configuring the Nation's Political Map during Emergency." *Shahid-ul News*. < Lalon and Terror_ Re-configuring the Nation's Political Map during Emergency >> ShahidulNews.mht > (accessed October 28, 2008 at 2100 (GMT))
- [3] "Baul Monument Removal: Call for Stand Against Bigots." *New Age*. < www.newagebd.com/2008/oct/25/front.html.mht > (accessed October 25, 2008 at 2200 (GMT))
- [4] Blanchard, Christopher M. "The Islamic Tradition of Wahhabism and Salafiyy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RS21695, updated January 24, 2008) < http://www.usembassy.it/pdf > (accessed September 28, 2008, 1500 (GMT))
- [5] "DU [Dhaka University] Rally Add Voice to Sculpture Protest." *bdnews24.com*, October 19, 2008. < www.bdnews24.com.mht > (accessed October 19, 2008 at 1300 (GMT))
- [6] *Khatum -E- Nabuwwat* (Undated). Pakistan: < www.khatm-e-nubuwwat.org/ > (accessed November 3, 2008 at 2300 (GMT))
- [7]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Mum about Baul Monument Removal." *New Age*, October 25, 2008. www.newagebd.com/2008/Oct/25/front.html.mht, accessed October 25, 2008 at 2125 (GMT).
- [8] "Protests over statues at Bangladesh Airport." < www.radioaustralia.net.au/news/stories/

- 200810/s2393516. htm? tab = latest > (accessed October 16, 2008 at 1800 (GMT))
- [9] “The Jihadist Terrorism in Bangladesh.” www. muktadhara. net/page77. html (accessed November 1, 2008 at 1745 (GMT))
- [10] “2 Killed, 60 Hurt in Bomb Attacks on Jatra Shows.” *The Daily Star*, January 16, 2005. www. thedailystar. net/2005/01/16/d5011601055. htm (accessed January 28, 2008, at 1700 (GMT))
- [11] Zakaria, Saimon. “Bipanna Mazar Sangskriti” (“The Mazar Culture at Stake”). *bdnews24. com*, May 28, 2008. < www. arts-bdnews24. com > (accessed June 05, 2008 at 1600 (GMT)) (Bangla text)

“政治狂欢”：易卜生戏剧与当代孟加拉国

沙菲·艾哈迈德

摘要：易卜生的戏剧，一方面被广泛地看作通过一个个体在行动和思想方面的自由程度来评价他/她的地位，另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延续中存在的困境。本文尝试把焦点放在当今孟加拉国的政治现实，并且基于对易卜生在《青年同盟》和《人民公敌》中所指出的社会、道德和政治问题的分析。

Abstract: Ibsen's play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evaluating the individual's social status by the extent of freedom s/he enjoys in action and thought and reflecting the dilemma in the continu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The present study is an attempt to focus on the current politics in Bangladesh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social, ethical and political issues as pointed out by Ibsen in *The League of Youth* and *An Enemy of the People*.

关键词：易卜生；《青年同盟》；《人民公敌》；孟加拉；政治

Key Words: Ibsen; *The League of Youth*; *An Enemy of the People*; Bangladesh; politics

易卜生跨文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都可以被发现。事实上娜拉的形象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特别在东方是非常广泛地被接受的，易卜生为文化、社会和政治的“据为己有”提供了无尽的资源。易卜生的戏剧一方面被广泛地看作通过一个个体在行动和思想方面的自由程度来评价他/她的地位，另一方面可以被看作社会结构的延续中存在的困境。但是他的戏剧中与像孟加拉国这样国家的社会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相关性的政治内容，却还没有在批评论述方面找到足够的空间。

当然，学术界或戏剧界并不是不知道易卜生（作为一个男人）在他的戏剧里对于政治也做出了一些额外的强调。他与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都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这与一些现代或当代剧作家并不一样。然而，易卜生特别在他其中两部戏剧《青年同盟》（1869年）和《人民公敌》（1882年）里表现出他对更具战略意义的政治问题的关心。

在这两部剧本中，易卜生相当直接地揭露出在公共机构中的利用各种政治社会关系的民意代表，实际上是以制度服务提供者的名义行使权力来统治人民。然而，易卜生这种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在某种程度上被他“更加重要的”对戏剧知识的探索所掩盖了。

一项对当代孟加拉国的政治形式及其在体制外

或体制内持续产生影响的那些因素的调查，将会提醒我们，在上面提及的两部戏剧中反映出的易卜生对于政治的关心，仍然与对它们的社会学解读有着重大的相关性。正如《青年同盟》里费尔博所指出的，对于权力的饥渴导致了政治狂欢。在当代孟加拉国，获得权力、持有权力和保护权力的激情表现在很多方面。在巩固可以将一些人或一个政治组织传送到权力的更高“层”的阶梯的促使之下，拓展社会关系是一种公开的技巧，它没有给意识形态的认同、高尚道德或社会责任留下空间。这在《青年同盟》里表现得很明显，年轻人在政治权利策略化的过程之中被哄骗、诱惑和暗示。更进一步地说，媒体的作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目前的孟加拉国，这或多或少是一个当代特有的现象。

权力和腐败的内在关系当然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然而，当代孟加拉国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腐败性的极端范例，这可以很容易且很明显地在对政治权力的滥用之中发现踪迹。长期以来，在孟加拉国的读者和戏剧活动家之中，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一直是一部广受欢迎的戏剧。世界著名的电影导演萨蒂亚吉特·罗伊基于这部剧本，通过改编和语境化的形式创作出了一部伟大的电影。其他一些人也做过相似的改编。在其中一些作品里，斯托克曼医生被虚构成为一个抵抗和道德的象征。

在这个背景之下,本文尝试把焦点放在当今孟加拉国政治的现实上,并且对易卜生在《青年同盟》和《人民公敌》中所指出的社会、道德和政治问题作出分析。

别忙,我亲爱的史丹斯戈,好好想一想。你说你要成为“呼声”,很好!但你打算在哪儿成为“呼声”呢?在本区里,还是至多在本县呢?你发出呼声,谁会响应你?谁会发动风暴?还不是梦森、阿斯拉克森和笨人巴斯丁那一伙嘛!到那时候咱们看见的不是皇帝国王,而是伦德斯达失掉了议员位置,在大风里乱跑。结果怎么样?风暴卷走的不过是你梦中最初看见的那些平常人。

这是易卜生戏剧《青年同盟》中费尔博对史丹斯戈所说的一段话。我们知道这段奇怪的话在剧本中出现得非常早。费尔博碰巧是一个本地医生。而史丹斯戈是一个律师,本地新来的一个人。他对于这个穿插着一些滥情行为的社会状态有着比较过激和奇怪的想法。史丹斯戈在一次为庆祝挪威独立日(5月17日)而举办的聚会上说出一些言辞激烈的话。这肯定是一个正式和高贵的相聚场合。而布拉茨柏在这个社区里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人,这样一个聚会理所当然是由他主持的。但是除了饮料和礼节,这个要人满堂的聚会还是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前的一次社交热身活动。

史丹斯戈是大约六周前来到这里的,但是到现在他已经完全地搞清楚了社会的脉搏,而且似乎是非常积极主动地要建立一个青年同盟来引发一些彻底的变革。通过他魅力十足的演说,他成功地吸引了一些热衷之人,他们都思想敏锐。他痛恨每年5月17日这天无聊乏味的节日庆祝。尽管他只在这里待了不到两个月,既看到了善与美的一面,又看到了卑鄙和丑陋的一面。在那次聚会上,他通过展示能说会道的天赋,让众宾客大吃了一惊:

我看见群众之中出色和伟大之人,可是也看见一股腐朽力量把那些有希望的人紧紧压住,不让他们发展。我看见诚实热心的青年抱着希望奋勇前进,可是他们的路被人堵住了。

他的演说不时地被人打断,不仅有人质疑,而且有人认为这荒谬的言行是精神错乱。史丹斯戈做出承诺:如果没有其他人来战胜恶龙,他将独自一人来做,并鼓励那些男孩子们要团结一致。他不断增加对那些聚集在此的年轻人的吸引力。他说:

咱们这些年轻人啊!这个时代属于咱们,

咱们可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咱们的权利正是咱们的义务!咱们应该有发挥才能、意志、力量的机会!大家听我说!我们必须组织一个同盟。财阀在咱们这儿掌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读者可能都会看出史丹斯戈的演说三番五次地被打断是要有意地去创造一些戏剧效果。在间隔之中,费尔博时不时地对着史丹斯戈耳语几句,他领会了这场表演的秘密,也了解史丹斯戈演说的背景。这部戏剧的中间部分是十分巧妙地安排的,在这里,我们只能看到费尔博和史丹斯戈相互交流、为公众的祸福而担忧,并在严肃的私人感情上荣辱与共。费尔博还向史丹斯戈提问:“但你是如何在幸福之中,沉醉于这些政治狂欢的呢?”在这个特定的英语译本中,我实在无法为易卜生所用的“orgies”这个词找出一个恰当的挪威词汇(*Eleven Plays of Henrik Ibsen*, 829),但是通常这个英语词汇是与完全堕落、腐败的违纪行为和滥性联系在一起的。

费尔博对于这种聚会的过程持有一个批评观点。独立日庆典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场合,但是至少有一些人是抱着别有所图的目的来参加这个聚会的。主持人布拉茨柏享有很高的宫廷头衔——这是由挪威国王授予那些有钱、有地位的男性的。安德·伦德斯达在表面上是布拉茨柏的朋友。他还是一个大地主和一名议会成员。梦森是这个县里的另一个大地主。他有一些实际的理由来嫉妒以上提及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享有本地的领导权很长时间了。阿斯拉克森是这里印刷所的老板。他不仅是聚会上所发生一切的近距离观察者,而且可以明显看出他也掌握一些玩转这场政治权利游戏的窍门。

易卜生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好奇地发现在13年之后,1882年出版的《人民公敌》里有一个具有相同名字和相同身份的阿斯拉克森。这场聚会是那些有权有势的精英们展示自我很好的舞台。史丹斯戈这个社区里的陌生人的出现,仅仅是进一步强调了隐藏的冲突。而且他进入这场已被定性为政治狂欢的场合之时,也带着某种不纯洁的动机。史丹斯戈具备很强的批判性。因为他不是本地人,所以他没有任何可靠的或虚假的同盟。他之所以强烈地想要建立青年同盟,明显是带着目的想要摆脱被布拉茨柏和伦德斯达们组织的庆典排除在外时所产生的空虚。然而,他的情感诉求在其他一些地方扎了根,并没有与社会的集体意愿连接起来,而只是他个人的心愿而已。

那些年轻男人们群聚在庆祝会上高兴地认可了史丹斯戈的演说。但不知为何,很可能是因为亨里克·易卜生刻意要让这部戏剧成为喜剧,这群年轻人的欢呼作为感情表达,也同样具有讽刺意味地出现在

剧本开头宣布酒会开始之时。我们也会发现在孟森和阿斯拉克森的对话之中,这种支持是缺乏严肃性和真诚性的。他们热情拥护史丹斯戈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年轻人同盟的尝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让那些长久把持贵族特权的人产生不利的流言蜚语和丑闻的妙招。阿斯拉克森太过急于给这个年轻的律师以很高的评价,尽管他还没有与社区的事务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孟森只是不情愿称伦德斯达为一个拥有自由灵魂之人。

这些人的聚会偶然地同时也固有地表现出传统的社会制度。宫廷大臣布拉茨柏作为一个国会议员和本县最有钱之人有着他的权力渊源。权力的集中自然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不受欢迎的政治状况,这一时期可以更好地解释为前民主时代。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制度的威胁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史丹斯戈的演说腔调是多么奇怪且有戏剧性,当费尔博帮助布拉茨柏理解了史丹斯戈术语里的目标所在时,布拉茨柏就皱起了他的眉头。布拉茨柏在他拥有着巨大权力的情况下,无论从哪方面都无法理解民主精神的缺失。这也暗示出在已建立的道德和社会持续之中存在的空白。罗宾·杨说得对:“该剧之中的争论不仅是由那些像史丹斯戈和孟森这样外来者对已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攻击,而且还有秩序内部的张力和弱点”。正如费尔博看到聚会中他未曾料到的转折和扭曲时,他对伦德斯达所说的“这是本地权力之争的开端”。

让我们对《青年同盟》中内容和信息以及易卜生表达的方式做一些更深入的分析。费尔博关于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开始的争端的评论是正确的。很明显,史丹斯戈将会领导这场斗争。他的演说立即得到了拥护。他还有写作的能力。而且阿斯拉克森还准备给予他十分重要的辅助力量——出版社。易卜生并没有创作很多喜剧,我们通过这一术语的字面意思了解了这一流派,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他在这类创作上有着足够的能力。他在成为史丹斯戈次要事务的、能给这个社会持续带来变革的言语表达之上花了很大的工夫。他一开始的重点放在孟森的女儿瑞娜身上。情节随着第一幕的结构如此之快的戏剧化的发展,可以证明易卜生是有意识地正在创作一部喜剧,在这部剧中,私人以一种讽刺的方式压住了公众。而且剧作家因此引导我们来调查社会和个人的疾病。

当布拉茨柏之女托拉递给他一封明晚赴宴的邀请信之后,史丹斯戈对既定体制的怒火被浇上了水。这位年轻的律师把这次邀请当做是对他通过激动人心的演说所赢得的对他的地位的欣赏和认可。当发现

被认为具有领导能力的史丹斯戈已经参加了一次大家提议的青年联盟的聚会之后不久,人们立刻兴奋起来了。但是史丹斯戈却拒绝参加。他似乎更加满足于赢得来自这位宫廷大臣家晚宴邀请的成功之中,而十分讽刺的是,在几分钟之前他还认为,这位大臣就算从字面上不能被称为“敌人”,但也肯定是完全不能代表人民的。这个“不神圣”的联盟可以说发生得太快了。难道在政治狂欢的氛围之下,史丹斯戈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演员吗?

尽管在传统戏剧中将情节拓展成多样的爱情关系是十分常见的,但是这部戏剧并没有打算从评论家那里获得这一方面的关注。通过对该剧进一步的观察,可以让我们看到亨里克·易卜生对于那些处于社会环境过度压力之下的个体的地位、角色和尊严的基本想法已经开始起作用了。易卜生是想要严肃地指出,可能是因为一小部分人手中的财富的堆积,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偏离。我们知道孟森承担了一个需要巨大投资的工程。他寻求布拉茨柏的支持,当然不是流动资金,而是去向他表示他打算给宫廷大臣一些分红。在戏的一开始,孟森决定与年轻一代一起走下去,但他不是在挑剔布拉茨柏在当局和政治上的地位,而是因为他不得不立即和他做一场商业上的游戏。在这俩人交谈期间,布拉茨柏对孟森和社会秩序被破坏很是不满。他对孟森说,即使意识到危险可能突然在初选的前夜出现——

如果你拥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你的正义感、你的良心呢?你摧毁了社会秩序又能如何!你损害了有钱人的名誉又能如何!当今的人们从不会去问这些财富从何而来,也不会去问这个家族拥有财富多久了;他们仅仅问:这些到底值多少钱!他们也因此而尊敬他。

这里我没必要去详述布拉茨柏的话了。读者只需要思考这部喜剧所包含的社会学的弦外之音。接下来,孟森走了出去。布拉茨柏的儿子埃吕克走了进来。他来报告了一场商业灾难,即他与孟森合伙,而现在巨大的银行债务已经让他破了产,除非他父亲来帮他。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剧本的这些部分,不仅是为了了解情节结构,而且还要指出易卜生时代的封建、前民主和前工业社会不道德的趋势,这让“个体”尊严在面对公司资本时不得不屈服。并且这些趋势仍然继续发展,没有希望得到改变。

在《青年同盟》出版二十年、《人民公敌》出版七年之后,埃德蒙·戈斯于1889年作出以下评论。

不久将来的希望已经沉沦于塞纳河,易卜生厌倦了注视地平线,开始来诊断凡人的道德疾

病的症状,正如他所看到的,欧洲正在逐渐走向社会死亡。社会的虚伪和个人主义的无情——这些都是他所看到的这个正在沉落的世界里内在的但普遍存在弊病的最首要的外在特征。即使没有变革社会的想法、没有传教士或慈善家似的热情,他也开始了新一波的研究。他将用一种空前准确、敏锐的目光,在欧洲政治爆炸之前把剩下的生命都用在记录社会失调的症状上。

戈斯描述的欧洲健康不佳的状况,在《青年同盟》之中很容易就能找到踪迹。这部戏对于颠覆社会秩序的强调是十分的明显。戈斯的话极其具有批判性,并且企图指出易卜生正在经历欧洲快速走上社会死亡的这一令人沮丧的状况。社会的死亡可能起源于从政治权威和财富积累角度所透出的个体对权力的渴望。这里一直持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竞赛,和由此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政治狂欢。许多评论家也发现亨里克·易卜生《青年同盟》和《人民公敌》这两部戏剧存在着一些意识形态上的相关性。这两部戏剧都与“权力”主题有关。对这一观点不同的处理导致了不同的决定性的结果。

《人民公敌》比《青年同盟》读者更众、被上演次数也更多。它的主题更加集中,结构也更加紧凑。冲突也是围绕着道德问题展开的。但在这部剧里,诚实个体的力量是通过具有英雄色彩的角色体现出来的。如果说前一部戏是集中权力的问题,即处于前封建社会的可接受结构之下的个体所占有的权力对于社会健康具有的破坏性效果;而后一部戏剧的主题是对于不道德的展示,这在一个民主机构准许的所谓多数人的保障之下,使之可在权力中心之中安全行走。但是大多数人的权力,组成了运行国家或它的附属机构的机制,最终压制了个体的灵魂,削弱或剥夺了他的地位。这再一次或明或暗地涉及政治权力的暗中行为。如果说易卜生在《青年同盟》里还只是隐喻的话,那么在《人民公敌》里他大声地说出了在一个新的民主管理的社会制度之下新闻界的作用。他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体会到的新闻界的权威似乎是扎根于唯利是图技巧的巨大发展,这一点狠狠地打击了那些所谓的“人民的声音”和“正确的选择”。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阿斯拉克森又一次出现了,这位出版行业的资本家一开始为正义的理由而奋斗,之后又因绝对的自私和不道德的原因而退缩了,由此创造出了一次狂欢,颠覆了这个社会组织。在《人民公敌》里,对权力的贪求赶走了所有的道德准则和多数人的力量,并膨胀到一定程度,击败了一个由个体所支撑的善的过程。易卜生对于国家压倒性的力量尤其感到不安和沮丧,因为它甚至可以把个体自由碾成粉末。这是这

部戏中我们讨论的一个例子。在一封易卜生给乔治·布兰德斯信中,他痛苦地写道:

国家是对个体的诅咒。普鲁士的国力是如何被购买的呢?随着个体在一个政治和地理公式中沉沦……国家必须消失!如果有变革的话,我将站在这一边。破坏国家的思想,在此位置上建立自发的行为,并且思想上的精神联系是唯一一对团结有益的,你就会开始具有自由的因素,因为这是件值得拥有的东西。

这时我想到了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是一位伟大的孟加拉语诗人和思想家,同时他也警告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强大的控制人类生活的机构对我们的威胁。他当然也提及孟加拉国和印度特殊的形势。他信仰个体和集体的力量,这是影响本地大众生存的重要因素。然而,我们也可以明显想到在《人名公敌》之中,“委员会”控制着“浴室”,在精神上,这与泰戈尔提出的概念十分吻合。根据所有的定义,这正是对于反应公共意志和福利的民主制度的拓展。但是当“政治”的动机和“权力”的阴谋诡计带着别有的用心进入过程之中,那么这一基本目标就在不知不觉之中陷入了危险。

《人民公敌》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也不需要我去提及故事情节的发展。但是十分有意义的是在《青年同盟》出版十三年之后,易卜生又给我们呈现出一些东西,包含了对之前我们所探讨的政治狂欢现象的一些修改。随着社会行政体系的发展,不仅那些人民代表们喜欢行使权力的特权,而且一种新的官僚体制开始实施了。新闻出版界作为一种新的势力出现了;它应当承担起人民的事业,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事业。但即使他们的“权力”非常大,有时也利用权力来推进政治狂欢,有时他们仅仅因为有来自于“更为强大”的统治阶层的压力,为了保护自己而退缩。在《人民公敌》之中,我们看到了阿斯拉克森和霍夫斯达。后者是《人民先锋报》的编辑。这部戏的故事情节发生在挪威北部一个美丽的海滨小镇。彼得·斯多科芒是一个关键角色。他是市长兼警察局长以及浴场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还担当一些其他职务。并且自然而然地,他想要成为权力的中心。但其他人却不一定喜欢他的权威,因此,权力再一次成为公众所讨厌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讨厌有一种隐藏的特性,因为公开强烈地反对“统治”权力包含着许多危险。

这出戏在汤姆斯·斯多科芒医生家的起居室里开场。他是个能干的医生,为人非常好,总是帮助那些边远农村地区的病人。他的女儿裴特拉总是轻柔

地抱怨她父亲的仁慈心肠。他是一个有思想的浴场设计师,而且目前还是浴场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小镇大受欢迎和繁荣的原因就是因为浴场。最为重要的是,他是那个权力强大的彼得·斯多科芒的弟弟。戏剧开场之后仅仅两分钟,这位市长就出现在台上。当他发现毕凌(一个记者)也在房里之后,本来高高兴兴的他变得沮丧起来。当霍夫斯达(《人民先锋报》的主编)三分钟之后从客厅进来,他就更加难受了。市长明显地变得恼怒起来。我们并不需要在此时市长不开心的原因上太过纠结。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霍夫斯达和斯多科芒医生之间的一段对话。

霍夫斯达:在这些官员手中,本镇的各项事务已逐渐的步入正轨了……

斯多科芒:不对,不是在官员手中,他们只是那些本镇富人的朋友和跟班,他们相互勾结。这些人才是掌权之人。

这段话反映出了权力的转移过程。那些本镇的官员、朋友、跟班和有钱人有发展成一个工作网络的趋势,这样他们就可以相互帮助并找到实现他们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而运转的圈子。他们为了一己私利而置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于不顾,他们之间经常干的勾当已成为一种常态,他们腐败、不道德、自私,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拓展他们的权力轴心。《人民公敌》在一个几乎民主的社会体系之下表现出基于选举和再选举的反常政治行为是一种令人悲伤的现实。这虽然不一定会导致费尔博在《青年联盟》中所说的“政治狂乱”,但是获得权力的目的和不择手段,并将之作为个人成功的跳板,是一种普遍现象。老实说,公共利益和所有美好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都可以被牺牲。

霍夫斯达在《人民先锋报》的编辑角色里表现出强烈的传教士似的热情。因为他传奇般的背景,他来自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对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非常了解。他坚称“当我接管了《人民先锋报》,我就带着明确目的,要打破这个顽固的由那些以往拥有权力的人所组成的圈子。”来自出版界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阿斯拉克森这样对斯多科芒医生说:“因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因为你的中产阶级背景。在这个镇子上,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你口中的团结的大多数——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想去,那就去。斯多科芒医生,让大多数人都站在你的一边,可是一件好事情啊。”

我们知道所有这类同情性的或支持性的言论都来自斯多科芒医生的一个让人吃惊的和令人同情的发现,那就是这个小镇的水源被污染了,导致了严重

的健康问题。霍夫斯达和阿斯拉克森似乎对于这种事态很是关心。因此他们极尽所能提供帮助。《人民先锋报》一直很欢迎斯多科芒医生所写的文章。我们并不想去质疑这两人宣告的社会承诺的有效性。但是他们对于在小镇的管理之中玩弄权力的看法,是与他们为了自己利益而建立的反对党也有些关联的。阿斯拉克森似乎很值得中产阶级支持。我们都知道中产阶级是一个容易两边倒的阶层。一方面因为他们不能从统治阶级那里寻得好处,从而对统治阶级相当挑剔;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获得一个好结局,而要与统治阶级维持一定的联系。阿斯拉克森将水源供应事件作为一个极端事件来关注,因为他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说:“那些掌权之人永远也不会对‘其他’人提出的任何建议感兴趣的。”对“其他”的强调是由亨里克·易卜生自己提出来的。阿斯拉克森宣称:“我在镇子里有一定的影响——有一点小小的权力”。因此,这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特权”的冲突。人们可能会去想权力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是在当地大受欢迎的代表——市长手里,还是在很大程度可以创造和促进公共舆论的新闻界手中呢?

这场冲突或许还有一些非常积极的方面。但不幸的是,这场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显示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权力。阿斯拉克森的关注点从来都不会和斯多科芒医生的一样。新闻界的人控制着媒体的力量,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需要来自于人民,以及更重要的是来自人民代表的认可。他就如同一个房主,向镇子里不断增多的游客出租房屋。这与他们的经济收益相关联。根据这个社会体系下的民主体制化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纳税人联盟的存在,而阿斯拉克森碰巧又是这个组织的主席。他的地位以及他在中产阶级团体里所起到的领导角色让他能够举行一次示威游行。但不难理解的是,比起认真而又诚挚地关注本镇的公共健康或者是公共福利,他更多是为了去炫耀他那小小的权力。

遗憾的是,带有英雄色彩的斯特科芒医生却无法理解阿斯拉克森身上那过于轻率和过于民粹主义的行为所体现出来任何缺点。而后者想要为斯多科芒举办一场招待会,并且连演讲稿都起草好了。动机是十分明显的。权力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而医生对于这个建议的肤浅的一面表现得很吃惊,阿斯拉克森说这是“镇民们”为了感谢斯多科芒医生所做的事情。阿斯拉克森对于他所建议的中产阶级行为非常小心。他说:“这篇演讲理所当然作了‘适当修改’,以免冒犯当局和掌权者。只要我们对此很小心,……(亨里克·易卜生的强调)。”阿斯拉克森甚至毫不犹豫地指出了中产阶级政治的利与弊。他代表着某种“特

论《裸者与死者》与《贝奥武甫》的否定互文性

丁秉伟

摘要: 诺曼·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与史诗《贝奥武甫》在形式上有着许多看似相似实则相反之处。《裸者与死者》运用了史诗的叙事模式和主要符号——英雄、死亡、继承者,并对这些符号进行重写,赋予其全新的意义,使文本间形成一种否定互文性。小说利用否定互文性谴责了美国社会中极权势力对人性的扼杀,表现出对人性光辉的期待。这种创作手法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社会现实的文学表征提供了新的手段。

Abstract: *The Naked and the Dead* and *Beowulf* are strikingly identical on narrative structure, but they are at odds with each other on many details. Mailer adopt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some signs in the epic such as hero, death and inheritor and rewrites them.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re is the negativ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Beowulf* and *The Naked and the Dead*, which Mailer employs to reveal the destructive nature of war and totalitarianism. Mailer's writing technique offers a new measure for creative writing in Postmodernist context.

关键词: 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贝奥武甫》;否定互文性

Key Words: Norman Mailer; *The Naked and the Dead*; *Beowulf*; negative intertextuality

2007年,美国文坛的两位一向对战争持坚定批判立场的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相继离开了人世。在伊拉克战争仍在继续的背景下,这两位二战后美国反战小说领军人物的去世使批评界重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梅勒的那部开创美国二战后反战小说之先河的经典力作——《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

《裸者与死者》因无情地揭露了美国军队中强权肆虐的现象并成功地塑造了侯恩、卡明斯、克洛夫特等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在当时,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却认为包括《裸者与死者》在内的二战后初期创作的小说只是传统的写实主义作品,缺乏新的写作手法。事实上,作为新新闻主义和非虚构小说的倡导者,梅勒从未停止过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文学表征与历史和现实间关系的思考,更未停止过对文学表现形式和策略的大胆创新。例如,他经常在作品中使用各种新闻剪报、日记、信件、他人的传记文本甚至照片。这种颇具争议的奇特表现形式恰好印证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于文学创作的看法:“作家只能模仿前人的姿态,他的文本永远不会

是原创的。他唯一的能力就是把不同的作品融合在一起,使它们相互对抗。”(巴特,147)

梅勒被誉为“一位书写史诗散文的艺术家”(Lounsbury, 139)。他对宏大历史叙事一直情有独钟,在六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先后创作了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反越战示威等重大社会、历史题材的小说。更有甚者,他把自己的作品《黑夜的军队》(*The Armies of the Night*)分为两个部分,并分别命名为“作为历史的小说”和作为“小说的历史”。他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也是一部历史题材、具有宏大历史叙事的小小说。

英语文学中的宏大历史叙事可追溯到英国文学的开山之作——《贝奥武甫》(*Beowulf*)。如果将这首史诗的叙事结构作一番归纳,可以简化为以下模式:挑战出现→英雄(主人公)战胜对手→挑战再次出现→英雄(主人公)再次战胜对手→最后的挑战出现→英雄(主人公)战死。这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模式对后世的英语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裸者与死者》也不例外,如果以侯恩为主线,全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以上模式完全吻合。但是两者在具体情节上却存在着许多相反之处。以下是两者的比较:

《贝奥武甫》:恶魔格兰代尔出现→贝奥武甫打

二、结局迥异的死亡之路

在两部作品中,死亡意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贝奥武甫》中前后共出现过四次葬礼,主人公贝奥武甫之死更是整部史诗的“压轴大戏”。贝奥武甫在位五十年,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然而,一条毒龙的出现使王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已年迈的贝奥武甫为保护臣民免遭伤害,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重上战场,最终身负重伤,不治身亡。人们不会忘记贝奥武甫在最后一次战斗前留下的豪言壮语:“在年轻时我参加过许多战斗。作为人民的保护者,如果有作恶者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再次投入战斗,建立功勋。”(Tuso, 44)悲壮的英雄之死为这些言语作出了最佳的注脚。在与实力远强于自己的邪恶力量的殊死搏斗中,他超越了人性的局限,完成了道德的升华。他的死始终闪耀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光芒。

在《裸者与死者》这部战争小说中,死亡的意象始终贯穿其中。小说开始时,美军即将登陆,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死亡的恐怖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谁也睡不着觉。天一亮突击登陆艇就要放下水去,第一批部队就要驾着小艇,劈开浪花,冲上安诺波佩岛的海滩了。这运兵船上,这整个船队里,人人心里都很明白:再过几个小时,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的死期就要到了。”(梅勒, 1)

美军登陆后随即与岛上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分到侦察排仅几个星期的新兵汉奈西不幸身亡。这小伙子是一名遵守军中守则十分自觉,自认有备无患的士兵。即使如此,他依然难逃厄运。汉奈西的死成了侦察排士兵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侯恩之死则更令人感慨万千。他曾把探索真谛作为自己的格言,在遭遇一次次失败后,他报名参军,来到这座人迹罕至的荒岛。在驶离美国的运兵船上,他似乎预感到了死亡的临近,想到了人们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死亡。显然,侯恩希望自己能像英雄般死去,希望自己的死能获得人们的高度评价。但是,他的希望再次落空了。侯恩率领侦察排执行的是一项极为冒险的计划,这项计划源于将军的一次突发奇想,即使将军本人也深知侯恩一行此去凶多吉少。更可悲的是,这次以失败告终的行动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侯恩所追求的英雄形象也是虚幻的,他的死没有任何意义。

与侯恩有着相似命运的还有威尔逊和罗思,他们都是为了这次没有意义的行动,稀里糊涂地送了性命,葬身荒野。在他们身后没有葬礼,没有随葬的宝

藏,没有百姓的哀悼,甚至没有人为他们的死扼腕叹息。更可悲的是,在那个残酷吞噬人类灵魂与肉体的战场——安诺波佩岛上,士兵们身陷虚无与悲观的泥潭不能自拔,他们既看不到生存的价值,也找不到死亡的意义,只能在无奈中走向死亡。历史与现实的差异使人不禁掩卷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类精神家园的破败荒芜?

三、追寻继承者

我们在分析《贝奥武甫》时不应忽视其中的另一重要人物威格拉夫(Wiglaf)。当贝奥武甫身边的其他十名随从因毒龙而心生胆怯全都溜烟逃进入树林时,只有这位青年英雄一人毅然挺身而出,不顾坚盾被烧得面目全非,胸甲无法为自己提供保护,奋不顾身地用利剑刺向毒龙的腰部,协助老国王斩杀了为害一方的毒龙。事实上,威格拉夫的出现暗合了史诗稍早部分出现的青年贝奥武甫只身远赴丹麦,降魔除恶的壮举。值得注意的是,贝奥武甫向赫罗斯加伸出援手,是因为他曾对自己的父亲有救命之恩。而威格拉夫舍命救下贝奥武甫,是因为“他不忘往昔贝奥武甫赐予的恩典……以及他父亲所享受的种种权利”(Tuso, 46)。两者的相似之处可以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老英雄知恩图报的美德已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得以延续。史诗接近尾声时,贝奥武甫将金项圈和战盔取下交给威格拉夫的举动更是颇具象征意味。

较之《裸者与死者》中其他的人物关系,侯恩与卡明斯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作为安诺波佩岛上美军的最高指挥官,卡明斯将军俨然是这个小岛的主宰。他深信“军队要治理得好,像梯子那样一级畏惧一级是必不可少的……对上级心存畏惧,对下级意有不屑,什么时候大家都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军队就可以发挥最大的威力了”(梅勒, 220)。可是“侯恩刚一派到师里,将军只跟他谈了半个钟点的话,就用他当自己的副官,而且慢慢地还日益把他引为心腹”(同上, 99)。将军本是军中一霸,区区少尉在他眼中无异于听差跟班。他肯屈尊将侯恩视为知己,是因为两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于中西部富有阶层,家庭教育和长期的军校生活造就了卡明斯冷漠霸道的性格。而侯恩虽然已和自己上流社会的家庭决裂,“接受了为家庭所不容的思想意识,可从来就没有真正扔下过前十八年生活留给他的感情的包袱”(同上, 211)。进入军队后,“他受将军的影响,竟超过了他之影响于将军”(同上, 100)。从某种程度上说,侯恩继承了将军的衣钵。甚至有时候,侯恩会觉得自己与卡明斯没有什么区别。卡明斯则在侯